



编者按：

叶嘉莹先生生于1924年，1945年开始教学生涯，至今已经70余年。叶先生说：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先生是用整个生命去传承和传播古典诗词，同时她非常关心古典诗词的普及工作。最近，叶先生

和她的弟子南开大学的张静老师，由《中国诗词大会》缘起，谈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薪火相传，她欣喜于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对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叶先生专门讲道：要将这篇谈话发表在《学习时报》，愿愿中华古典诗词成为更多中国人生命中的指路明灯！

好将一点红炉雪 散作人间照夜灯

——叶嘉莹先生关于《中国诗词大会》的对话

□张 静

张静：作为一档由教育部、国家语委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的全民参与的诗词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已经连续播出了五年，您对这个节目有怎样的评价？

叶嘉莹：《中国诗词大会》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因为通过这个节目能够看到现在我们国内这么多人都喜爱古典诗词，这真是一个文化振兴的现象。不但是我自己，而且我在日本的侄子、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学生们也常常通过手机和电邮纷纷给我传来节目的讯息。这个节目办得非常好，对于推广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引发大家阅读诗词的兴趣确实是很有帮助的！作为一名96岁的老人，看到我们社会上无论男女老幼、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人士都对古典诗词仍有浓厚的兴趣，我真是高兴，觉得自己上世纪70年代末回国教授古典诗词的选择没有错！

张静：五年来《中国诗词大会》一直将中国古典诗词与选手的人生故事紧密结合，陆续推出了很多与诗词相伴的普通人的故事，比如一战成名后改变人生轨迹的快递小哥、来自基层的干警、戍边战士、与病魔抗争的中年夫妇，您对这种带着故事做节目的方式有怎样的看法？

叶嘉莹：要知道中国古人作诗，

是带着身世经历、生活体验，融入自己的理想志意而写的，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了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作品，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中国诗词大会》出彩之处就在于节目立意高远，内容环节不不仅有古典诗词的背诵、古代文化常识的识记，更重要的是在传递我们民族代代相传的诗词文化中特有的精神品格。《弟子规》里言“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中国诗词大会》既不推崇娱乐至上，也不倚重记问之学，虽然是一档竞赛节目，但谦谦君子、鸿儒谈笑展现出的是我们民族的气度与风貌；重在参与、播撒种子体现出各年龄层次诗词爱好者的胸襟与担当。参赛选手们的言行践行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正是他们的取舍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妙义。《荀子·劝学》篇云：“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今日的我们诵读千载以上的诗词，读的不仅仅是能背会写、刻舟求剑，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去体会那一颗颗诗心，与古人的生命情感发生碰撞，进而提升自己当下的修为。

张静：有数据统计，自2016年《中国诗词大会》开播以来出版的古典诗词读本有百余种之多，而且第五季《中国诗词大会》的报名人数约40万人，是第一季报名人数13倍，不禁想起古人的诗句“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

叶嘉莹：是的，《中国诗词大会》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响，使我更加坚信：中国的古典诗词绝对不会消亡。古典诗词凝聚着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志趣、气度、神韵，是我们民族的血脉，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只要有感觉、有感情、有修养的人，就一定能够读出诗词中所蕴含的真诚的、充满兴发感动之力的生命，这种生命是生生不已的。愿中国的古典诗词可以成为更多人身生命中的指路明灯！

张静：《中国诗词大会》播出五年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带动了很多语言文化类电视节目，您对这些节目还有什么建议和期许吗？

叶嘉莹：如果在诗词佳句记忆、诗词故事解读、诗词常识考查之外，把古典诗词的声调之美与情意之深，在节目中也能够表现出来就更好了！教育部一直在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国诗词大会》是其中的品牌活动，实际上，教育

部去年还首次举办了“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也是诵读工程的一项活动。比赛以我的别号命名，专门面向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师，强调的就是古典诗词的读诵与讲解。去年暑期决赛选手来南开参加现场比赛时，虽然我还在病中，但仍然亲自到40年前我首次回国执教时的阶梯教室与大家见了面，讲到了我自己的两大心愿：一个是把自己对于诗歌中之生命的体会，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另一个则是把真正的诗歌吟诵传给后世。听说教育部还会把这个赛事持续举办下去，希望能选拔出一批优秀的语文教师，也可以考虑与媒体节目融合，大家一起把我们古典诗词的薪火传承下去。

张静：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持续蔓延，特别需要全世界携起手来共克时艰。您有没有想到哪首诗作可以与大家共同分享？

叶嘉莹：作为一位96岁的老人，我一生经历过很多患难。记得2007年的冬季我因肺炎住院，病愈后曾写过一首和友人的小诗：“雪冷不妨春意到，病痊愈欣见好诗来。但使生机犹未尽，红萼还向月中开。”我也坚信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之洲”的无名者，是“河汉清且浅，脉脉不得语”的无名者，是写出了此时此刻“定理公式般”一字不可易、一字不可改的千古诗句的无名诗人。

崔颢和李白关于黄鹤楼的题诗佳话，是一个极具阐释学意义的“中华诗词”表达范式。一个诗人，怀揣汉语之笔登临某处，面对千古景色，秉持汉语工具，穷尽诗家才情，吟哦出的是“一曲定乾坤”的极致表达。这样的表达一旦被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定格，在同一个千年尺度传统之中的李白，便在这样的景色面前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慨叹。这是一句欣喜莫名的慨叹，也是千载传统中“诗人同在”的相惜和温暖。

这是一个以中华汉语为传统的数千年持续涌流的记忆长河，所有的诗人都在这长河中储存最为珍贵的诗句，所有操持同一种语言的读者都在以自己的阅读，复活着千古沉浮的诗句，以每一代的阅读，擦拭、打磨、照亮着灿若星河、砥柱中流的诗篇诗句。每一个中国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文化血脉，每一个诗人在这里追寻、恢复到“无名”而又永恒的“中华诗人”的神圣而谦卑的状态。

这些璀璨闪耀的诗句诗篇，是我们借以认出自己“我是谁”的“文化身份证”。这些诗篇连接的，是那个无数人、无限时间共同汇聚起的“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储存宝库。随着全球华人的脚步拓展，无论华夏儿女散落在何处，只要凭借着“床前明月光”的诗句，都会找到汉语节奏之下的“低头思故乡”。一代代人都会在低头寻得的“故乡”，和那个巨大而深厚的民族记忆相连。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随着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们的增加，这种原本属于汉民族的绚烂记忆，将会在更多的民族和人群中，找到共鸣和知音。

中华古典诗词，是一面镜鉴，一种声音，一抹馨香，一道划过寰宇天空的虹霓，凭借这千载汇聚的灵魂和精神，使得我们找到自己身体记忆里的文化血脉，确认我们语言镜鉴中的精神面容，从而与我们自己，以及遥远的亲人们恍如梦寐、秉烛相认。

我原本不写诗，只是近10年来，才不间断地学习写诗，且乐此不疲。那么，为什么这么乐于写诗，写诗又给我带来了什么乐趣呢？坐下写作本文之前，例行的餐后散步中，我凑成四句，尝试以诗作答：诗词何以乐，言志也抒情。一字推敲苦，突来大喜生。

习惯了的事情容易乐于为之

我曾有文章介绍过，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驱使我学习书法，书法界提倡书写自作诗推动我学习写诗，写诗的时间哪里来？散步路上，参观途中。于是，只要散步，我就开始琢磨写什么；只要参观，我就注意有什么好写。这样做，开始是强迫自己，慢慢地就成了习惯。

所谓习惯，就是持之以恒的行为。习惯都是养成的。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只要坚持，有规律地重复，久而久之，就可以成为习惯，习惯则成自然，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可以轻松为之、乐意为之。我喜欢写诗，就是这么培养起来的。

人们公认文稿写作是最痛苦的差事，然而，我有一位同事，组织安排他离开研究室而到别的部门任“一把手”，要在别人求之不得，他却不甚乐意，告诉我：“我就喜欢写文稿，习惯了！”

我之乐于写诗，就是如此！习惯了的事，就会乐于为之！

乐于为之的事情可以创造乐趣

这是说，一旦乐于写诗，那么，写诗就能带来乐趣。某年我去澳大利亚，特地去菲利普岛看企鹅从远海捕食回巢的情景。离预定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于是我就坐在观众席上冒着大风寒冷写了一首《等企鹅回巢》。

诗之乐更多地存在于满足各种邀请和请求时。比如，每年各地都有不少纪念或庆祝之类的专题书法邀请展，我书写的都是自作诗。再比如，子女结婚、新居布置、60岁以上亲朋好友过寿等，每年都有索诗要字的，我都予以满足。再比如，每年都有博士生毕业，我都主动写诗并以书法形式奉送；……乐，就产生于自己能够满足他人的需求中。

诗之乐还体现诗人或作者间的唱和之中。2017年12月9日晚间，我接到诗坛名宿周笃文先生短信，打开一看喜不自胜。他写道：诗意中国颁奖会喜晤文影、小包漫成。笃文戏笔：久别重瞻国士风，英姿毅彩几人同？吟坛纪录重重破，喜看诗潮拥破空。

这首诗表达的是白天他和我们一起参加包岩女士操持的“诗意中国”颁奖会而久别重逢及诗坛空前繁荣的喜悦。我随即步笃文老师原韵，和道：华楼意外沐仙风，神采飞扬往日同。晚读清诗犹面晤，深情一拥借长空。

没想到，当天晚上11：44，笃文老师回复：喜读次韵，深佩高情。再和：泱泱文采见高风，李杜苏黄兴略同。妙笔生花吾辈事，中宵飞梦滞星空。再赓来韵，冀博高明珍示。笃文上。

次日清晨，定时铃声把我闹醒，一睁眼就读到笃文老师的再和诗，十分高兴，在赴首都机场途中，我再次步韵奉和：一序悠然见雅风，行云流水大师同。奉传千古文章事，话不容留半句空。

“一序”即笃文老师为我的《周文彰诗词选》所赐的序，写得特别动情用心，给我这个初学者以很大动力。我的感受是，唱和，一定是作者乐于写诗的心情表露，也是享受写诗之乐的主观行为，否

□周文彰

乐于写诗和写诗之乐

则，不可能用、也用不好这种表达方式。

奇事常生奇趣

因为见缝插针地把零星时间用于写诗，自然，天长日久，难免会因诗而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来，此即所谓“奇事”。比如，散步写诗碰树撞人、候机写诗误机等，此类事情不多，发生之时并不好受，但入诗之后则感到十分有趣。

2015年5月5日到北京南站乘高铁，没到检票时间，我就在候车大厅兜圈子散步，找题材写诗，差点撞上匆匆旅客。我顿时来了灵感：就写《高铁候车大厅散步》：人来客往尽匆匆，左右回旋可走通。愣有肥妞迎面来，慌忙躲闪撞花丛。

2016年4月6日傍晚6：50，我从杭州坐高铁到镇江，因与博士生胡登良通电话谈论文，直到接站的老乡电话催我出站，我才知道列车已过镇江正向南京奔驰。我在南京南站广场等从镇江赶来接我的小车，一边围着行李散步，一边写成这首题为《误站》的绝句，宁南即指南京南站：全神贯注电登良，高铁飞驰过镇江。座上惊腾时已晚，宁南静等至空场。

2017年3月14日我在某部委培训中心讲课，为其优美的环境所动，写了一首七绝，然后早到达首都机场，准备飞青岛。因为有了误站的教训，我特地坐到登机口，边整理这首诗边听登机招呼，但直到起飞时间过了仍没有动静。于是起身打听，才知道我坐错了登机口，飞机已经飞走了。折腾一气，换好两个小时之后再飞的机票后，我又写了这首《误机》诗：临行痴醉酌诗词，物我皆抛两不知。待到回神疑误点，航鹰振翅起飞时。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误机当时我很是着急，事后，它反倒成了我津津乐道之事。这便是我所说的“奇事常生奇趣”。

现在，诗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深知我写诗还在初级阶段，但我的确“乐于写诗”，也尝到了“写诗之乐”。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话没错。但学习和做事在很多方面、很多时候并不是来自兴趣，而是出于压力。兴趣常常是在学习和做事到了一定程度后才渐渐产生的。当以学习和做事为乐并享受其乐时，学习和做事就进入良性轨道了。

学诗之路漫长，我当继续奋进！



古典诗词与文化血脉

□杨少波

维。每一种语言的诗歌形式，都是这一种语言的最高表达，是这一语言中的音乐因素和意义因素最为幽微玄妙的聚合。这种诗歌的最高表达方式，常常是这一人群“民族性”最为幽微安适的栖身之处。这一民族秉持自己的独特语言，对于世界整体的特殊感受、特殊思考，这一民族心灵深处与天地宇宙最为独特的关系，那“只有站在我这个角度，才能看到的独特风景”，也常常栖身在此诗词之中，这也是被翻译为另一种语言之时，最为难以转译、最容易漏掉的部分。

当面对人生的暂时困顿，“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旷达；身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纷繁复杂境况，彻悟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未来前景；不怕“山重水复疑无路”，只要有“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笃定豁达，就会在“吟啸且徐行”的道路转折处，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终将到来的澄明境界。中国诗词，以特殊的方式，对这个世界贡献着属于这门语言的贡献。

哲学家德里达来到中国时，为东方思维的特殊“通幽曲径”和“高蹈超迈”所震惊，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无哲学”。德里达的“中国无哲学”并不是对于中国建立在汉语语言特点之上的思维的贬抑，而是一位西方哲学家对于超然独步于西方思维之外的“中国东方思维”高山仰止的惊叹和赞誉。东方中国，有着独特的建立在“诗性”语言之上的思维利器，在德里达眼中，有着不同于西方发源、西方传统的“爱智慧”的方式。

“诗与思”，西方建立在“对话”（dialogue）形式之上的“辩证法”（dialectic）思维，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塑造着整个西方的思维整体图景的结构框架。东方建立在视觉诗性的文字之上的汉语，以及汉语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其“诗性”“直观”“整体”“概括”等思维特质，对整个东方世界构成巨大的影响。东西方思维方式互有优长，它们共同为人类“思”的方式提供着独特的道路。

中华古典诗词，其中有“道”，追根溯源“诗”，《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诗，志也。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华古典诗词，与人们的内心言志紧密相关，诗歌之自然合乐而发，是距离人们内心最为自然和接近的语言表达形式。

思维无法离开语言，语言即是思

诗与思